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

章开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

章开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章开沅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8-7

I. ①辛… II. ①章… III. ①辛亥革命—研究 ②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15 号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

作者:章开沅 ©

责任编辑:张建英

责任校对:罗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3

字数:352千字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69.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了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自序

按青少年时代的爱好和志愿，我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诗人”，或是专门写使人瞌睡的小说的等外“作家”。至于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那多少有些出于偶然。只是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多年实践过程中，自己才逐步增强了对这门学科的认识与热爱。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岁月里长大的。当我们刚会唱歌，学的就是抗战救亡歌曲；刚会作文，写的就是如何洗雪国耻之类的题目。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腐败，使我们备尝颠沛流离、失学失业之苦；山河破碎和民族屈辱，则使我们幼稚的心灵遭受更为痛苦的熬煎。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比较容易对那些爱国御侮、革新救亡的史事产生共鸣。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一些早期作品，多半是结合教学工作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撰写的，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有关制度政策、维新思潮、反洋教斗争等等。面较宽但缺乏深度，不过多少丰富了一些教学内容，并为进一步钻研提供了必要的基础。1961年秋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促使我把辛亥革命史作为自己的长期研究方向。武昌作为首义之区的历史地位，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学者的热情勉励，与许多辛亥老人的频繁交往，这些都是驱使我努力钻研的客观因素。但更为有力地吸引着我的，却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颇为宽阔的学术天地，需要研究的课题简直俯拾皆是。在这个领域里，前人留下的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并不甚多，颇像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只

要辛勤耕耘，即可望大有收获。

对于辛亥革命史的探索，我的工作是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开始的，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此为侧重点。就研究序列而言，开头是透过资产阶级的活动轨迹剖析其阶级性格，然后再着重研究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可以说是一种逆行的探究。从1962年开始的张謇研究，目的也是通过这个状元资本家，考察他所厕身的社会集团，并且进一步剖析他生活于其间的那个时代与中国社会。这种研究自然是饶有兴味的，但“左”的干扰却使我过早中断了自己的工作。1964年因所谓“李秀成评价问题”横遭批判以后，不久又继之以更大的无妄之灾，从此即长期蹉跎。直到1976年秋，林增平同志与我受人民出版社委托，共同主持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编撰工作，才重新恢复了停顿已久的学术研究。

粉碎“四人帮”和肃清“左”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从我个人的研究工作来说，思路较之以前也有所开展，并力图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年我的研究课题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是关于20世纪初年那个中国社会。当然，二者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实为一个整体。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仁人志士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与历史责任感，自动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人去国离乡，抛妻别子，牺牲个人家庭幸福，追求祖国独立富强。即使是远涉重洋，去国万里，他们也是日日夜夜关注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倾听祖国的呼唤。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却没有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他们的事业与生命都是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生在中国是否幸福？据此山河绝好之大舞台是奋发有为还是蹉跎岁月？这些提问如佛作狮子吼，不仅当年有力地叩击着千千万万爱国志士的心弦，就是现今每

一个中国人，难道不也应该以此扪心自问吗？

当然，这些仁人志士们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对刚刚到来的 20 世纪的预测，对新的时代潮流的分析，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术的传播，对旧学和封建道德的批判以及重新清理传统文化的尝试，在政治学、史学、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革新和革命的努力，都给我们留下一笔相当丰富的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批判和继承（或称为批判地继承），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所承袭的深重的封建传统影响，他们的思想局限、性格弱点以及历史各阶段上的分化浮沉，同样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溯其社会根源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既要研究这一代人，就不能不研究产生这一代人的社会。他们栖息活动于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中，思想言行都受它的影响和制约。当然，先进的中国人决不是消极的，他们要求改造这个社会，并且为了改造而努力认识这个社会。20 世纪初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界，好些省的同乡会都设立了调查部并且拟订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提纲。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了演出输入文明之剧而“测量此舞台”；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了解国情。这是一桩极为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历史太久，国际国内政治关系又太复杂。辛亥时期那一代人尽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并没有真正认清近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证明他们引进的救国之道并不符合客观环境。经过从辛亥到“五四”期间的困苦摸索，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以新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民族命运，并且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驳斥了“马列主义不适合国情”的恶毒攻击；如果对中国社会没有正确了解，怎么可能制订出适合国情的方针、路线、策略、政策？但人的认识永远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运动过程，何况作为认识对象的近代中国社会是这样奇特复杂，并且又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我们这才发现自己对国情的已有认识毕竟是有限度的。至少，我们对封建主义影响的深远就估计不足，否则个人崇拜何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泛滥一时？“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何以能够一度那样猖狂？失败与挫折使

人们聪明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对中国国情的再认识，是我们民族智慧复苏与建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继续，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强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剖析，不仅为发展辛亥革命研究所必需，就是对于今天的“四化”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我把这本论文集取名为《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尽管选入的二十篇文章对于近代社会的探讨并不全面，这仅仅是表达一种主观愿望而已。个人的能量总归是有限的，何况才疏学浅如我。这些微薄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史研究来说，不过如沧海之一粟。在结集过程中，除个别地方略做文字变动以外，对各个时期的文章尽量保持其原来面目，让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我当时的认识状态，包括我的幼稚、粗疏、困惑以至失误。这决非敝帚自珍和因循保守，而是希望让后学者比较容易了解前人的探索过程，或许可以从中吸取若干对他们有用的经验教训。

我们高兴地看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但是，与中国近代历史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个小小的史学分支仍然是年轻的和不成熟的，许许多多困难而又复杂的课题正等待着我们去解决。为了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促使富有科学价值的著作更多更快更好地涌现，我想，提出下面三个问题也许是有意义的。

第一，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仍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史和其他任何人类文明史一样，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贯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充满着斗争、依存、制约、渗透、转化，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本质又常常隐藏在现象后面，真是迂回曲折、纷繁复杂、扑朔迷离、流变不居。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就会堕入史料的大海而不能自拔，面对着宛如乱麻的众多史事而困惑难解。那些见木不见林的学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历史事变的总体则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

当然，我们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决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向经典著作寻找有关结论，因为那也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正确的方法论来探索隐藏

在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辛亥革命史研究产生越来越多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好著作。

第二，继续加强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同志努力从事各种专题研究并且取得明显进展，基本上克服了过去某些喜爱大而无当的泛论的毛病。但是，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总体来说，可以而且需要探讨的专题仍然极多。即以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而言，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阶级内部上中下层结构的剖析，当然都需要继续深入探讨。但是，为使这种研究取得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就不能停留于不分行业、地区的“一揽子”式的考察和论述。要认真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他们对于欧洲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不仅分别研究了各个地区的特点，并且着重分别研究了金融、商业、工业等各种类型的阶级性格差异。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也早已强调指出：“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品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还不免有粗略之处，今后应该更加认真、细致、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以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港埠、集镇……举凡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以及他们栖息并且活动于其间的社会环境，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只有逐步弄清各个侧面，才能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资产阶级的整体，并对这个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动向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我总有一种感觉，即迄今为止仍然缺少出版一部全面的堪称通史规格的辛亥革命史的足够研究基础。必须首先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中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辛亥革命史，写出“证据确凿”和“胜于雄辩”的学术著作。

第三，对资料工作也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切，对于辛亥革命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与浩如烟海的全部辛亥革命史资料相比较，这不过是很小

一部分，还有大量档案、文献、报刊、手稿至今未能加以整理和利用。对于英、美、日、法等国有档案文献，近年来在课题研究中密切注意者日益增多，而且日本外交文书和英国蓝皮书的选译出版工作亦有进展。但更多富有价值的内容仍然保持在原始档案之中，特别是各地外国领事及其他派遣人员的商务报告和各種情报，往往更为生动具体地记录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把这些卷帙浩繁的外文资料选择、整理、编译出来，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是国内已经发掘和出版的资料，也大多没有经过“批判地审查”，不像太平天国史那样有多年的史料考订辨伪工作可以作为研究基础。姑且不论清方文献如何对辛亥革命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就是一般资产阶级报刊，对这场革命也充满着不准确甚至伪造的新闻报道。革命领导人和一些重要骨干亲自写的回忆录诚然极有价值，但党同伐异、自我夸耀、文过饰非亦在所不免，因时隔多年而记忆失真的情况更比比皆是。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加严谨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资料工作，舍得花费大气力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出版和考订，切切实实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雄厚基础。

最后，还需要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通过相互辩难、相互校正、相互补益，发展正确的结论，改正错误的见解，深化对于历史事物的认识。要切实改变那种等待外界出题目、对好口径写文章的消极被动状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胆略和锐气。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极为丰富，可以研究的课题成千上万，我们应该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新领域，发掘新资料，钻研新课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开辟研究工作的新天地。在研究方法、论述层次、文字风格以至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也应该鼓励勇于探索、勇于尝试的精神，形成多种多样的家法和路数，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更快出现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

这就是我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谨向海内外读者表达的若干心愿。

章开沅

1983年夏于南湖之滨

目 录

自序·····	(1)
时代·祖国·乡里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一·····	(1)
论辛亥国魂之陶铸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二·····	(19)
“排满”与民族运动·····	(34)
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	
——1903年的国内革命思潮·····	(53)
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	(72)
论张謇的矛盾性格·····	(106)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	
——答台北学者·····	(131)
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	(159)
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	(165)
有关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几个问题·····	(184)
太平天国在天京实行的几种制度·····	(196)
试论中国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潮·····	(204)
1900年前后湖北地区的反洋教斗争·····	(217)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	(228)
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	(248)
试论1913年的“二次革命”·····	(268)
论张勋复辟·····	(292)

同盟会会名探源·····	(327)
“傲霜花艳岭南枝” ——评历史故事片《林则徐》·····	(334)
血染峭壁凝春华 ——半壁山太平军千人冢调查·····	(342)
后记·····	(350)